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美] 欧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著 马睿 译 郑须弥 审校

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Precious Volumes

「美」欧大年 (Daniel L. Overmyer) 著 马睿译 郑须弥 审校

宝卷 ——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Precious Volumes



全国百佳出版社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Copyright©Harvard College 1999

本书全球中文简体版由美国哈佛大学授予中央编译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版权所有,非经书面授权,禁止以任何形式进行摘录、复制或转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 (美)欧大年 (Overmayer, D. L.) 著;马睿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1

书名原文: Precious Volumes

ISBN 978-7-5117-1099-4

I. ①宝…

II. ①欧… ②马…

III. ①宗教-经籍-研究-中国-16世纪~17世纪

IV. ①B9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9457号

宝卷:十六至十七世纪中国宗教经卷导论

出版人 和 龔

责任编辑 郑 锦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36号(100032)

电 话 (010) 66509360 66509236 (总编室)

(010) 66509246 (编辑部)

(010) 66509364 (发行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网 址 www.cctpbook.com

E-mail edit@cctpbook.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瑞哲印刷厂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 数 314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总 序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 3000 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 15 世纪、16 世纪开始，直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 1644 年到 1912 年共延续了 268 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 18 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 19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

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载，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惊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近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载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对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

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文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科学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译者序

这本书的翻译历时两年，其间译者做了大量艰苦的查阅和相关考证工作，与英文版作者欧大年先生随时沟通，并请教了数位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专家老师。如今中译本终于在多方努力下完成了，这让我深感欣慰。由于本书内容方面的特殊性，我首先要就若干翻译问题做出几点说明。

一、宝卷文本。在本书翻译工作之初，我听从欧大年先生的建议，请教了国内民间宗教方面的专家、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的马西沙老师。马西沙老师建议我前往国家图书馆查阅王见川、林万传主编《明清民间宗教经卷文献》（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及其续编（12册；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濮文起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民间宝卷》（20册；合肥：黄山书社，2005年）以及张希舜等主编的《宝卷初集》（40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由于《宝卷初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的书刊保存本库，查阅起来不大方便，本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查阅和引用的是前两种文献集成，同时在文本缺失的情况下考察《宝卷初集》中是否收录有所需文本。本书正文中提到的大多数文本都可以在这两本文献集成中找到原文，但第三章的最后一节（“罗清的五部经卷对于其他宗教团体的文本的影响”）中

提到的两个文本、附录八和附录九中列举的部分文本则没有被收入上述任何一个文献集成。因此，以下文本是欧大年先生亲自邮寄给我的：《销释圆觉宝卷》、《销释安养实际宝卷》、《销释科意正宗宝卷》、《佛说当来弥勒出细宝卷》和《销释准提复生宝卷》；另外两部文本，即《弘阳秘妙显性结果经》和《弘阳至理归宗思乡宝卷》，因为本书英文版的写作时间与现在已相隔十年，欧大年先生也找不到了。译者多方查证，多亏社科院的韩秉方老师提醒我注意宋军所著《清代弘阳教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其中提到这两部宝卷的原本均收藏于天津图书馆，我才在本书责编郑锦女士以及清史编纂委员会老师的热心帮助下，在天津图书馆看到了这两部文本的孤本。

二、就引用文本中出现的英译文与中文原文不符或英文中提供的页码和章节索引有差异的情况，译者认为，除了欧大年先生亲自寄给我的文本之外，其他文本很可能有多个版本。因此，本书采用了脚注，标注了译者所使用的文本出处、英文原文，以及不符情况的具体说明。在此特别说明，本书中每一章节的脚注为译者注，其他的脚注为原作者的注释，尾注标记为上标〔1〕、〔2〕、〔3〕……为章注，而就原文与上述欧大年先生亲自提供的文本之间的不符，以及少数几处较明显的原文笔误或理解错误的情况，译者也在多方查证和确认的情况下，在各章节的脚注中做了说明，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尽可能使用了确认为正确的宝卷原文。

三、断句和标点符号。除文本外，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还查阅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其中包括马西沙先生主编的《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民间宗教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马西沙、韩秉方著《中国民间宗教史》（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以及郑振铎先生所著《中国俗文学史》（2册；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等等。在本书翻译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断句问题，译者参照这几本参考文献，对断句和标点符号的处理原则是，如果原宝卷文本有断句（多是句号），则尽量在翻译中照用原文本的断句；如果原宝卷文本没有断句，则尽量按照原作者的理解断句，同时参照研究界约定俗成的规矩。例如3/3/4格式的十字攒，断句一般都是“……（三字），……（三字），……（四字）。”我在翻译过程中沿用了这一标点方法。

另外，特别感谢英文版作者欧大年先生在本书漫长的翻译过程中给我提供的大量帮助、鼓励，并慷慨地给我寄来他所收藏的宝贵文本。诚如欧大年先生在与我的通信中所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仍然觉得互联网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它使得我们的沟通如此顺畅、快捷、方便。感谢本书责编郑锦女士惠予我翻译本书的机会，让我得以通过本书的翻译工作了解到中国民间宗教文献中竟然藏有一个这样丰富绚烂的世界，其研究工作也大有可为。更重要的是，从一个国外汉学家的视角来观察这个世界，的确能够得到许多有趣的发现和结论。因此翻译过程虽然艰苦，但我始终对拥有这样的机遇心存感激。感谢郑锦女士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向我提供的及时、耐心、细致的帮助。感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老师们提供的协助。感谢马西沙和韩秉方两位老师以及天津社科院的濮文起老师的指教，特别感谢韩秉方老师在我最绝望地查找那两部孤本时给予我的宝贵提示。感谢本书审稿人郑须弥女士的慷慨赐教、对待初译稿的宽容耐心，以及在审稿过程中不厌其烦地与我沟通讨论。最后，感谢我的爱人朱邦芊，从本书最初的文本查阅和考证，到翻译过程中的四次校稿，再到最终的排版和统筹，是他的鼓励一直

支持我尽全力做到最好，也是他毫无怨言、不求回报地做了那么多细致繁琐的工作。

以下人士对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予协助并做出了辛勤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激：美国埃默里大学周鹏博士、剑桥大学出版社北京代表处周岩女士、中国农业大学郑湘如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吴樯博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沈非博士以及美国联合神学研究院的白居惕（Judith A. Berling）教授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苏德朴（Stephen Eskildsen）博士。

译者 马睿

2009年10月30日

序

本书介绍了中国明代（1368—1644 年）和清代（1644—1911 年）最初数十年期间，中国各民间宗教教派撰写的各类书籍。这些书籍通称为宝卷（意即宝贵的卷册）。16 世纪和 17 世纪是这些文本的形成时期，这些文本包括关于教义和仪式的训导，据信都是神透露给教派教祖的，因此被认定为宗教经卷。

自 1976 年以来，我收集、影印或阅读了 131 种各种类型、各个时期的宝卷文本，包括其中有些文本的不同版本的影印本。过去的几个世纪，这些文献或丢失、或被销毁的数目成千上万，但我认为，我收集到的这些是现存文本中很有代表性的。这些材料是我 1981 年和 1991 年两次赴华期间收集的；还有一些来自美国、中国台湾和苏联的图书馆，以及日本、美国和欧洲的学者慷慨地给我寄来的副本。1994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重印的 148 部宝卷（见张希舜等编：《宝卷初集》）也对我帮助不少。

本书主要基于可以有根据地追溯至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三十四种教派经卷文本，其中有些不止一个版本，同时还参考了在这些文本前后出现的若干其他书籍。目前已经出版了好几部关于宝卷的总目，也有少数关于单个文本的研究，但本书是第

一部以西方文字写成的相关研究著作，主要探讨这类书籍的内容，随着时间的积淀，它们已经逐渐形成成为一种文体。

在我自己的著述中，关于宝卷的研究包括一本写于1976年的书，该书介绍了我当时称之为民间佛教教派的内容、几篇关于宝卷及其主题的文章以及我在1986年和焦大卫（David K. Jordan）合著的关于台湾民间宗教教派的著作，这些都可以看做是本研究著作的准备工作。（这些出版物均列于书后的《参考书目》中。）不过，本书仍应被视为基础研究，我希望能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更深层次的研究。

感谢以下人士在本书的长期准备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天津社会科学院的李世瑜先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博士（Victor Mair）、三一大学的那原道博士（Randall Nadeau）、普林斯顿大学的韩书瑞博士（Susan Naquin）、筑波大学的野口铁郎博士（Noguchi Tetsurō）、立正大学的酒井忠夫博士（Sakai Tadao）、加州州立大学萨克拉门托分校的石汉椿博士（Richard Shek）、台湾中正大学的王见川先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吴晓铃先生。特别感谢中国教派经卷研究的先驱学者李世瑜先生，在1981年和1991年，李先生在我寻找和研究本书中部分文本的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内尔·帕克先生（Neil Parker）帮我誊抄手稿；感谢该大学亚洲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谢诗贤（S. Y. Tse）和T. 高纳米（T. Gonnami）；感谢我的研究生柯若朴（Philip Clart）和苏庆华（Soo Khin - wah）以及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约翰·R. 泽尔墨（John R. Ziemer）和维多利亚·R. M. 司各特（Victoria R. M. Scott）精心细致的编辑工作。

还要感谢以下各组织在我进行本研究期间提供的时间和资

金方面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助会、（加拿大）社会科学及人文研究理事会、王安研究院、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

我的妻子埃思苔拉·欧沃梅尔（娘家姓贝拉斯克斯）的爱与支持更是我完成这项重任所不可或缺的。

还要感谢我们亲爱的宠物猫——辛加，它在我从事这项研究项目的过程中一直趴在手稿上陪伴着我，一会儿啃咬书页，一会儿又把笔和橡皮筋拍到地上，提醒我在写书之外，生活中还有许多其他的乐趣。

欧大年

1998年8月于香港

前 言

由俗家信徒领袖领导的民间教派从元代（1264—1368 年）以后便在中国活跃起来，这些民间教派有着各自的组织、仪轨和信仰。虽然在 14 世纪和 15 世纪的史料中偶尔会提到这类宗教团体有自己的经卷文本，但在我本人迄今发现和读到的此类书籍中，最早的是 1430 年的版本，此书被称为宝卷，讲述的神话是：宇宙时间分为三个阶段，由三位佛陀相继主持，最终主持的是未来佛——弥勒佛，在 16 世纪的此类书籍中，这一主题相当普遍。从史料中我们得知，声称代表弥勒佛的宗教团体活跃了好几个世纪，特别是在蒙古人（元代）统治衰亡期间，即 14 世纪中期的内战时期。久已确立的民间信仰在明代宗教经卷中以书面形式出现。

1430 年以后，学术界熟知的另一种教派宝卷由一位名叫罗清（1442—1527 年）的佛教居士撰写，并于 1509 年问世。这些宝卷受到禅宗传统的很大影响，没有提到三世佛的神话；而 1523 年的一本书重新提到并进一步发展了三世佛神话，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 1430 年的那部宝卷为基础的。因此，到 16 世纪的前 25 年，存在着宝卷教义的两种流派，由罗清创立的那一派更加注重个人的内心。罗清的“五部六册”成为一种教派即无为教传统的基础。该教派追溯罗清为其创始教祖。这

一教派传统后来又产生了好几种后世宝卷，其中有些受到三佛/弥勒佛神话的影响。从16世纪中期以后，该神话成为大多数宝卷的基本内容。

至少从1430年开始，以弥勒佛为主要神祇的神话就同女性神祇联系起来，这些女性神祇被不同的教派称为“母”、“祖母”或“老母”，迄今尚未在这一时期之前的教派活动历史记录中发现有关她们的记述。在1430年的宝卷文本中共有30处提到这类神祇，她们全都行使着天庭中神职官员的职责。不过，该文本最主要的神祇还是古佛阿弥陀佛，出于对苦难众生的爱，他向人们传授了该书的内容。本书第四章论及的1523年宝卷中仍然提到这类母神，但这些母神在地位上从属于一个佛。罗清的视角更加抽象而神秘；在他看来，终极现实乃是能够带来精神自由的“真空”的实现。这种真空是万事万物的起源，在某些篇章中，罗清将其等同于“母”。在罗清这里，“母”仍然是一种神秘象征，而不是神话中的神祇，但它体现出作者强烈渴望拥有宗教上的自信，正如他在精神自传《苦功悟道卷》中生动描述的那样。罗清所做的重新诠释，其作用是将“母”的概念提升为宇宙的起源。在他本人的著述中，这一概念并未取代真空（他给予了“真空”各种不同的说法和拟人化），但在后世教派文本中，“母”成为最主要的神祇、所有神和佛的女性统领、人类的宇宙之母。

由于罗清的文本在各个教派间广为流传，他的教义似乎可被看作一种催化剂，促使许多“母”转变为一个无生老母；无论如何，到16世纪末叶，众母神的确已为无生老母所取代。无生老母将诸佛派往人间，两种神话主题就这样密切联系起来。从那时起，这成了大多数教派宝卷教义的基本框架。直至今天，我们仍然能够从扶乩（一种长期形成的、由诸神直接

向人类做出启示的宗教形式，这些神仍然受到台湾、香港和华语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的敬拜）文本中看出这一点。明代早期的教派神话传统就这样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我所看到的所有明代问世的宝卷都以大字体印在长方形卡纸上，折叠起来装订成所谓的经折装，每页约 14 英寸（36 厘米）高、5 英寸（13 厘米）宽。它们一般包括一卷或两卷，每卷再分为不同数目的品和分。书名印在一张长条状白纸上，粘贴于封面。翻开许多这类书籍的封面，首先会看到诸佛和众神形象的版画，随后是祈祷皇帝万岁、国泰民安和渴求普度众生的句子。然后是内标题，它可能不同于封面上的标题，其后是几行韵文，呼唤诸佛和众神在人们背诵此书时降临人间。接下来是开篇段落，概括说明全书及其要旨。该段落既有偈文又有白文，有些还有目录，罗列了各品的题目。

开篇段落通常有几页篇幅，之后即可看到第一品的题目和品号^①另起一行现于纸上，随后是一段白文体的讲解，后以偈文总结。白文与偈文交替贯穿全章，只是偈文的风格时有变化。在许多宝卷中，每一品快要结束时都有一个曲牌名，引出一段应予唱诵的押韵赞词。这段赞词和几行结束性的唱颂偈文就此结束了这一品。每一品都会提出若干新的主题，但内容也有大量重复；这类宝卷显然主要是为了在宗教仪式上吟诵而非说教，不过其中也常会出现教义教条。每卷的结尾和开头都有明显标记。某些宝卷文本的结尾处会有重印按语和捐赠人名单，每笔捐赠的款额也都一一列出。

上述模式时有变化，但其固定不变的特点足以使之区别于

① 各品目录出现的形式一般为“题目 + 品第*”，如“叹世无常品第一”（《苦功悟道卷》）。——译者注

其他类型的文本。宝卷的传统英译名是“precious scrolls”，但我在本书中使用了“volumes”一词，因为宝卷的形式根本与卷轴（scroll）无关，也因为汉语的“卷”的确可作“书”或“卷册”（volume）解。

在内容上，教派宝卷有以下特点：使用简单的文言文，间或掺杂白话句法结构；白文段落与七言和十言偈文交替出现，偈文通常是押韵的；直接进行神话、教义和道德说教。

正如姜士彬（David Johnson）^[1]所指出，宝卷最初是为演唱目的而产生的——在各个教派中，它们是集体崇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上香和上供之后同声歌唱和吟诵，在风格上类似于佛教寺庵中的和尚和尼姑背诵经文。而在其他情况下，宝卷文本也可能是由一个主要表演者或一个表演小团体为一群听众吟诵的。本书讨论的宝卷中的某些段落读来像是教祖或佛的讲解或讲道，随后还有一段与信徒的对话，但我还不清楚这究竟是当时的教派惯例还是一种文学手法。

宝卷教义被声称为基本真理的一种全新神授介质，该真理长期以来一直不为人知，现在却能够通过宝卷这种介质被所有信徒，特别是那些因缘际会的人（有缘人）所知晓。这样的启示恰出现在末劫的混乱和毁灭之前；佛或母已经开始怜悯刚愎自用的苦难众生，在宝卷文本中给了他们最后一个获救的机会。虔诚信仰、适当修行的人们将获救，在一个全新境界中享有转生，从此脱离一切苦难，而那些错过好消息的人将万劫不复。从这一角度来说，其他宗教传统，包括其他教派团体，都可能是荒谬的，应该受到批判或贬抑。在宝卷中还提到一些特殊的保护神、教祖、信众和法会，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宗教上的自我认同。

另一类同样被称为宝卷的书籍一般是以说教故事为基础，